



IPER 工作论文 第 1503 号
2015 年 2 月 10 日

韩 剑
icedsword@163.com
徐秀军
xjxu@cass.org.cn

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党派政治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定吸引外资政策方面，美国各州扮演了相对独立的角色。在此背景下，作者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党派政治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假说。为了证明这一假说，论文采用 2009–2012 年中国对美国各州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各州党派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对绿地投资影响比跨国并购更加显著；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税收、贸易规模等其他因素给定的前提下，中国企业会优先选择在左翼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的州进行投资。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党派政治影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从静态分配效应看，外资流入引起东道国对劳动需求增加，导致工资水平提高和资本收益下降。该分配效应使劳动力充裕的所有者鼓励外资流入，而资本充裕的所有者倾向于实施限制外资的政策。从动态角度看，由于外资投入的资产专用性，外国投资者希望将投入与东道国利益捆绑，减少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劳动者联盟与外国投资者构成一种互补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其结果是劳动者联盟会比资本所有者联盟更欢迎外资流入。这些分析与讨论不仅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党派政治 党派价格效应 资产专用性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 本文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8 期。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资本流入的顺周期性及其宏观审慎管理（项目编号：71103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一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直接投资（FDI）在中美国际经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受制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差异，两国之间直接投资流动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流动。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中国商务部估计，截至 2012 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 500-700 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 4.4%；相比较而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仅占美国吸引外资总额的 1%。^①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相对提升、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以及“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在品牌、技术、管理、产品、战略联盟和运营等各方面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因此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2007-2012 年期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100%；2012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达 52 亿美元。中国成为对美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也由此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经济地理理论，主要分为三大学派：一是成本学派，二是市场学派，三是行为学派。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基本是从经济的因素考察企业的选址，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成本最小化和最大限度服务目标市场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函数。而行为学派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包括政府政策、风险和投资环境等，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家总是根据掌握的信息，对区位趋向的最优化做出理性决策。^②英国学者约翰·邓宁（John H. Dunning）将投资国、东道国及投资主体的因素统一起来，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概括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分为四类：市场需求、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以及技术水平，而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则包括：政治稳定性、鼓

^①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Data,” <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dilfdibal.htm>, 登录时间：2013 年 4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fec.mofcom.gov.cn/channel/tjzl.shtml>, 登录时间：2013 年 4 月 21 日。

^② Alfred Weber,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pp.156-188; Allan Pred, “*Behaviour and Location, Foundations for a Geographic and Dynamic Location Theory*, Part I, Lund: C. W. K. Gleerup, 1967, pp.58-65.



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以及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①邓宁同时指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前两种优势与企业本身的能力和 market 结构有关，后一种优势源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且共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②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政治因素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者从中国的案例出发，认为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稳定性和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双方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双方友好外交关系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有效促进两国投资关系的发展。^③

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不同的党派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拥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党派政治以及政党的政策倾向因此在一国对外经济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党派政治的角度研究吸引外资政策中的政治因素，对认识和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独特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且能作为其他角度的研究的有益补充。美国作为一个联邦体制的国家，拥有典型的党派政治特征，因此选取美国作为案例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利，州和地方政府的外资政策在美国整个外资政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对许多外国投资者来说，州和地方政府的外资政策已经成为他们对美投资所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探讨党派政治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本文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解释性理论假说，并试图通过实证的方式，分析美国各州党派倾向对其吸引中国 FDI 规模的影响加以检验。

二 研究基础与理论假说

^① John H. Dunning and Sarianna M.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325-356.

^② John H. Dunning and Sarianna M. Lundan, “Institutions and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5, No.4, 2008, pp.573-593.

^③ 贺书锋、郭羽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载《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3-16页；张建红：《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载《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第16-22页；丁辉侠、冯宗宪、王青：《投资来源国的特定因素对中国 FDI 的影响——以多维度要素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12期，第63-68页；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第21-35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以及跨国公司影响力的日益上升，政府的政策自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行为体。例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和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等学者多次强调，市场从国家那里夺走了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民族国家的经济作用日渐式微，民族经济的显著差异不复存在。^①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不仅提出了所谓的垄断优势理论，也就是公司之所以能够进行跨国经营，是因为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垄断优势，而且分析了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海默指出，跨国公司试图按照公司内部的分工模式，重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工模式。面对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海默担心民族国家失去控制经济政策的能力。^②尽管全球化限制了政府的政策选择，但尚无证据可以证明各国政府在监管标准方面有所妥协。相反，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分配与政策方面引起了大量的政治摩擦。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它比贸易活动更深入到东道国境内，对东道国国内政治影响也就更大。

在贸易政策上，制定关税的权力一般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而且是处理边界性事务的。在美国，这一权力归属主要来自于美国宪法的授权，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并不被允许参与外贸。然而，美国宪法设立当初并没有涉及到外资，美国的联邦主义和全球化动力给了地方政府权力和动力去吸收外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可以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③比如，部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给新开办的外资企业以 5-15 年的财产税减免，这些财产包括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允许外资企业的工厂和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通过发行支持工业项目的地方性债券，筹集资金以购买或建立工厂和其他商业设施，然后再把这些工厂和设施租给外国投资者，通过这种筹措方式，可以使外国投资者节省大量投资初期的资本开支。此外，一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扩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

^① 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56-399;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② Stephen Hymer, "The Efficiency (Contradiction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2, 1970, pp.441-448.

^③ 钟飞腾：《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2 期，第 138-150 页。



供电、供水等各种基础设施，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还提供一些特殊服务，如给外资设立的新工厂提供设计和布局的咨询服务，给外资企业利用当地大学或政府研究和开发机构的便利，支持外资企业培训工人的计划等等。

企业在跨国投资时，往往与政府的偏好优先权保持一致，这意味着政府的政治偏好可能影响投资政策。个体的偏好及其想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动机影响政策制定的需求，而政治家目标函数和政治制度造成的限制与激励，使得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影响政策制定的供给。由于 FDI 的进入而受损失的政治家们将尽力驱逐出 FDI，而从 FDI 中受益的政治家们希望引入 FDI。进一步而言，偏好本身无法解释政治产出，有动力推动政策变化的在任官员需要有能力使投资政策通过立法或颁布法规。在所有设定中，这种能力是关于政策制定制度的函数。供求条件必须存在交点，那些有动力去改变政策的人必须接近政策制定者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动机与机会这两个条件使我们能够预测究竟是鼓励 FDI 的联盟还是反对 FDI 的联盟获胜，党派政府推行的政策与外国投资者的偏好之间的交点决定了哪些国家会接受更多的 FDI。

（一）党派价格效应与政党偏好

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会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这一论断最早起源于贸易福利效应的研究中。在经济学中，“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model）和“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为分析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提供了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模型，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影响，国际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①“李嘉图—维纳”模型以行业部门为基础，假定存在着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而且这些要素是特定的，只能用来生产某些特定产品。贸易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进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根据上述模型，贸易扩张会通过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对国内政治分化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选择。

^① 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A.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 No.1, 1941, pp.58-73.



与贸易模型相比，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A. Frieden）参照依据李嘉图—维纳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集中关注资本跨国流动的分配含义，并根据资本流动的程度考虑不同经济政策的分配含义。^①1997年，美国学者丹尼斯·奎因（Dennis Quinn）将这套分析框架应用到资本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研究中。他认为与商品流动类似，资本流动同样存在着基于要素充裕度不同的相对价格效应，并称之为“党派价格效应（partisan price effects）”，不同的党派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相对收入的变化最终会影响资本流动政策的选择。^②2000年，冈瑟·舒尔策（Günther G. Schulze）专门构造了基于不同资本和劳动要素禀赋的资本管制模型，分析资本流出限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该政策模型的结论表明，资本流入会增加劳动和技术回报，减少资本所得；而资本流出则会减少劳动和技术回报，但会增加资本所得。因此，劳动力和技术充裕的所有者倾向于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资本充裕的所有者则更倾向于鼓励资本流出。^③

巴勃罗·平托（Pablo M. Pinto）对FDI的“党派价格效应”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一般情况下，FDI会引起东道国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水平提高和资本收益下降，这样的分配效应会使东道国政府在管理FDI时产生政治分歧，为提高自身收益水平，劳动力充裕的所有者会倾向于鼓励FDI流入，相反，资本充裕的所有者会实施限制FDI的政策。他将党派倾向分为两类：“亲劳工”导向和“亲资本”导向。一般来说，“亲劳工”导向的都是左翼政党，他们的收入依靠劳动工资和社会福利，右翼政党是“亲资本”导向的，他们追逐的是资本的高额利润。例如，在欧洲，左派指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他们会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在美国，虽然与劳动者的联系较弱，但很明显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倾向于提高劳动者的利益。^④

根据“党派价格效应”的分析，FDI流入将会影响东道国政府中各生产要素的报酬，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外商投资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对劳动或者资本的

^① Jeffrey A.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4, 1991, pp.425-451.

^② Dennis Quinn, “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 No.3, 1997, pp.31-51.

^③ Günther G. Schulz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Contr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68-82.

^④ Pablo M. Pinto, *Partisan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Why the Left Lov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FDI Loves the Lef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相对需求。如果 FDI 提高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我们预期工资水平会提高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会下降。但另一方面，FDI 流入也会增加政府收入，要素所有者也可从中获取效用。亲劳动的政府在制定税率时会更多地考虑工人的诉求，也就是说工人的效用水平在政府的决策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反之，亲资本的政府将会优先考虑企业主的偏好。因此，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取决于其对劳动或资本的亲和程度，以劳动与资本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代表，两个极端值为政府只关心资本或只关心劳动。只关心劳动的政府将设置最低的税率，只关心收入最大化的政府将设定中间水平的税率，而只关心资本的政府会设置最严格的条件。当亲劳动的政府当权时，投资者会易于进入东道国投资，而当亲资本的政府当权时，投资者的进入会面临更多障碍。

发展中国家从 20 世纪开始，以吸引外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外资政策却经历了很大的波动。^①同一时期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同的外资政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又实行不同的外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东道国政府的党派政治倾向有关。比如，1946 年代表劳工利益的阿根廷前总统庇隆 (Juan Domingo Perón) 当选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化和限制外资的政策。1948 年，阿根廷将英国拥有的铁路、美国电话公司和法国码头设施国有化，同时清理国家外债，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发展。表面上看，这一现象与之前的理论假设相反，即亲劳动的政府反而采取限制外资的政策。但众所周知，庇隆在第一任期时政治立场更为复杂，他不但要维护工人利益，同时还要赢得军队支持，另外，为了能使本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复苏，还要向国内企业家和大资本家做出让步。相反，在 1952 年第二次当选阿根廷总统后，庇隆成为一个纯正的“劳工领袖”，他不但竭力主张保障劳工利益、提高劳工待遇，而且在外资政策上放弃了之前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积极吸引外资。1953 年，庇隆政府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达成协议，由该公司负责在阿根廷勘探、开采石油；庇隆政府还鼓励外资在工业部门，尤其是汽车产业投资，促进阿根廷工业产品的出口。由此可见，庇隆政府对外资态度的改变与

^① 张岩贵：《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波动的性质、特征、原因及其趋势》，载《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1 期，第 63-68 页。



其党派政治倾向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①

(二) 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行为与党派利益交换

资产专用性 (Asset Specificity), 是新制度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 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在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时指出, 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 一项投资一旦被用于特定用途后, 具有“锁定 (Lock in)”的效应, 很难改作他用, 或者改作其他用途就可能会丧失全部或部分价值, 因此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行业, 其交易形成的路径依赖性越强。^② 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五类: 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物理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约服务的资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由于专用性资产只对特定的使用人有价值, 对其他人则一文不值, 因此, 当交易的一方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 准租的大小等于承租人最优使用的价值与另一承租人次优使用价值的差额, 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大, 可占用性准租也就越大。^③ 本杰明·克莱因 (Benjamin Klein) 认为, 准租的存在就像一块“馅饼”, 交易双方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但对于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来说, 他处于谈判的不利地位, 因为另一方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来侵占专用性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当可占用性准租越多时, 就会激发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缔约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方式之一, 但当缔约成本超过纵向一体化成本时, 纵向一体化企业就会产生。^④

对于任何公司来说, 技术和知识往往隐含在生产过程之中, 是一种典型的专用性资产。一般情况下, 跨国公司都占有技术和知识的优势, 并希望将其与海外市场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 一旦在东道国境内开展投资, 从东道国逃离或撤离的能力较弱。无形专利资产虽然能在国际间流动但只适用于特定活动或用途, 由于资产转移的代价昂贵, 因而跨国投资者将要面对投资收益被东道国政府扣押的风险。为

^① Pablo M. Pinto, “Does Partisanship Affect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October 14-15, 2005.

^②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1, No.2, 1971, pp.112-123.

^③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7, No.3, 1981, pp.548-577.

^④ Benjamin Klein, “Vertical Integration as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The Fisher Body-General Motors Relationship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4, No.1, 1988, pp.199-213.



了减少资产被东道国政府没收的可能性，外国投资者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是当政府有没收资产意图时，主动承担转移成本并离开该国；二是投资计划实施前就终止投资计划。

双边友好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以促进经济活动中各种交易的顺利进行。在威廉姆森的关系合同理论中，关系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系和合同之间事实上被假定为没有摩擦。在他看来，在存在专用性资产和多次交易的情况下，因为关系的维持具有价值，从而双方有形成持久关系的需要，所以关系将会自然发展起来。熟悉有助于经济交流的实现：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细致差异信号能被灵敏地发送和接收，专用的语言发展起来了，制度和信任关系也都逐渐发育。友好外交塑造了一种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增强了企业认同，从而有助于跨国投资。在同等条件下，东道国政治家可能倾向于把其国内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转让给与其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求同存异、不干涉他国主权与意识形态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友好外交活动“减少了主权、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也减少了东道国领导人对中国投资行为的偏见，甚至纠正了其对中国投资的认知、规范和管制行为”。^①

即使如此，东道国政府在与国外投资者谈判时会遇到典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这种时间不一致性会诱发东道国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一旦投资落地，东道国政府就可能改变许诺给投资者的政策。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投资者的投资额巨大或者资产专用性较高，东道国政府就有更大的动机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其结果就是不管东道国政府在事前是否给投资者承诺优越的政策条件，在事后都将按照自身利益重新评估这些政策，甚至完全抛弃事前的承诺，从而使投资变为次优选择。

针对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平托提出了一种基于东道国政府党派性而非制度约束的承诺机制，这一机制类似于“交换人质”行为。^②威廉姆森曾讨论过通过交换人质来保证和平的逻辑，并将结论用于处理长期合约的非正式机制的研究中。人

^① 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45-147页。

^② Santiago M. Pinto and Pablo M. Pinto,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Partisan Governments, Wages and Employment,”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IPES), November 9-10, 2007.



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担保，促使契约的自我执行。^①投资者是具有战略性的，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政治环境采用相应的投资策略。他们可以运用一种生产方式使他们的命运与东道国经济代理人捆绑在一起，从而将东道国的经济代理人作为自己的“人质”。该经济代理人应该是当权者联盟的核心成员。这样的选择可以让投资更安全，因为如果投资者离开东道国的话，将使政府面临一个隐性成本；如果东道国政府企图没收外国投资者资产并将严重损害国内政治团体的利益，这又是当局者无法承担的后果，那么这笔投资将会是安全的，因而这降低了政府出尔反尔的可能性。

从党派利益的角度，如果外国投资者采用的生产技术需要大量劳动，那么劳动者的利益就和投资者捆绑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当东道国能给投资者带来比在其他国家生产更大的利润时，投资者才会进入东道国，与此同时东道国的劳动者也会从 FDI 的进入中获益，如果 FDI 退出东道国，那么劳动者会受损。劳动者联盟与资本所有者联盟相比，与外国投资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劳动者联盟将会比资本所有者联盟更欢迎 FDI，特别是当 FDI 带来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时更是如此。只要劳动者联盟依然是当权者或者投资者可以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来调整生产方式，劳动者联盟支持的政府不但会保证有利于 FDI 的投资制度，而且会长期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在这一动态分析中，党派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承诺机制建立在利益相互嵌入的基础上，由此决定了亲劳动的政府会更加欢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对于 FDI 而言，也倾向于选择劳动者联盟当权的政府。

三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 变量选择

为了验证以上理论假说，我们采用 2009-2012 年中国对美国各州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主要的变量及数据来源简述如下：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是党派政治倾向对美国各州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

^① Oliver E. Williamson, “Credible Commitments: 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3, No.4, 1983, pp.519-540.



资的影响，不言而喻，对外直接投资即为被解释变量（FDI）。我们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首先采用的指标是美国 44 个州（特区）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额^①，用 VFDI 来表示。由于不同项目投资金额差异较大，为了更准确反映各州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我们用各州吸引中国投资的企业数作为另一指标，用 NFDI 表示。

2. 解释变量。根据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经济关系，一般假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内部存在两大特殊利益集团：工人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利益集团。与之相对应，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划分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以美国为例，美国两大党派之间的利益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美国经济政策的取向。左翼政党也就是民主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他们的收入依靠劳动工资和社会福利；右翼政党即共和党代表的是工商业界以及金融资本家，他们追逐的是资本的高额利润。^②我们根据各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民主党党员占总议员数量的比重，来反映各州政府的政党属性和政党倾向，该比重越高，表明该州民主党的党派倾向越高。相对来说，众议院一般被认为较参议院更具党派色彩，因此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各州众议院中的民主党比重，用 PARTY 表示。2012 年美国 44 个州（特区）参议院和众议院党派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2 年美国 44 个州（特区）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比例

单位：%

州名	参议员	众议员	州名	参议员	众议员
亚拉巴马州	34.29	38.10	密西西比州	40.38	47.54
阿拉斯加州	50.00	45.00	密苏里州	23.53	34.36
亚利桑那州	30.00	33.33	蒙大拿州	44.00	32.00
阿肯色州	62.50	55.00	内布拉斯加州	0.00	N.A.
加利福尼亚州	62.50	65.00	内华达州	52.38	61.90

^① 本文的样本没有包括美国所有的州和行政区，是因为所有数据来源于美国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对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的数据监测，该数据库仅包括了在美国 44 个州（特区）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数量、交易额、产业构成以及投资方式等信息。

^② 韩剑、高海红：《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6 期，第 123-136 页。



科罗拉多州	57.14	49.23	新罕布什尔州	20.83	26.00
康涅狄格州	61.11	66.23	新泽西州	60.00	60.00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84.62	N.A.	新墨西哥州	64.29	51.43
佛罗里达州	30.00	32.50	纽约州	48.39	66.00
佐治亚州	35.71	35.00	北卡罗来纳州	38.00	43.33
夏威夷州	96.00	84.31	俄亥俄州	30.30	40.40
爱达荷州	20.00	18.57	俄克拉何马州	31.25	30.69
伊利诺伊州	59.32	54.24	俄勒冈州	53.33	50.00
印第安纳州	26.00	40.00	宾夕法尼亚州	40.00	44.83
艾奥瓦州	52.00	40.00	罗得岛州	76.32	86.67
堪萨斯州	20.00	26.40	南卡罗来纳州	41.30	38.71
肯塔基州	39.47	59.00	田纳西州	39.39	34.34
路易斯安那州	38.46	42.86	得克萨斯州	38.71	32.67
马里兰州	74.47	69.50	犹他州	24.14	22.67
马塞诸塞州	87.50	78.75	弗吉尼亚州	50.00	32.00
密歇根州	31.58	41.82	华盛顿州	55.10	57.14
明尼苏达州	41.79	45.52	威斯康星州	48.48	39.39

注：内布拉斯加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众议员是一院制，因此无党派构成数据；“N.A.”表示数据不详。

资料来源：美国州议会全国委员会（NCSL），有网址或文献来源请补充。

3. 控制变量。(1) 市场规模（记为 PGDP）。从国际生产资本流动的总体趋向来看，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可以说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地点选择的首要因素，发达国家集中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 FDI 与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分不开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动机便是寻求新的产品销售市场，为降低出口的运输成本和绕过贸易壁垒，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生产最终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对于这类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其定



位决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即使是在次国家一级的层面上，地区市场的规模仍然决定了 FDI 的空间分布。本文采用美国各州年度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于 BEA 数据库。^①

（2）劳动力成本（WAGE）。劳动力的工资成本是跨国公司区位决策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是技术实力，但对于那些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而言，其竞争力的核心却是生产成本的高低，而劳动成本作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为降低劳动成本的支出，提高产品的成本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决策重点便是比较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准，从中选择最为理想的地点进行投资。本文采用各州的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指标，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动统计局（BLS）。^②

（3）技术水平（记为 TECH）。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等技术要素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研发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被称为技术寻求型 FDI。根据邓宁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动因的分类，技术寻求型 FDI 是战略性资产寻求动机的具体化，是以接近或获取东道国的技术和研发资源，分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效益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投资。^③近年来中国的华为、中兴通讯、上汽、南汽、吉利等一大批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了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投资活动，通过对高技术国家的投资，主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迅速提升企业的技术实力，有效获取东道国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本文采用美国各州人均申请的专利数作为技术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基金会网站（NSF）。^④

（4）税收成本（记为 TAX）。在其他区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会影响投资净收益，进而影响 FDI 的区位决策。1985-1994 年，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那些税收天堂国家的 FDI 增长了 5 倍，超过了 2000 亿美元。1996-2000 年，爱尔兰、荷兰、卢森堡和瑞士 4 个税收比较优惠的欧洲国家，虽然 GDP 只占欧盟的 9%，但吸引来自美国的 FDI 却占 38%。鲁德·穆伊（Ruud A. de Mooij）和谢夫·埃德文（Sjef Ederveen）对 1984-2001 年间的 25 篇计量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FDI

^①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 登录时间: 2014 年 6 月 10 日。

^② <http://www.bls.gov/data/#wages>, 登录时间: 2014 年 6 月 10 日。

^③ John H. Dunning and Sarianna M.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008.

^④ <http://www.nsf.gov/statistics/natlpatterns>, 登录时间: 2014 年 6 月 12 日。



的平均税率弹性系数为-3.3，即税率每提高1%，流入的FDI将减少3.3%。^①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税收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大小在不同跨国公司之间有较大差别，与市场导向型和寻求特定区位优势的公司相比，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那些税收政策更为有利的地区，小规模企业比大型企业对于税收激励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制造业跨国企业更偏好与加速折旧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因为它们比服务业使用更多的固定资产。由于不同税种各州差异太大，本文采用各州的税收总额除以GDP反映各国的平均税负水平，数据来源于BEA数据库。^②加注释，引用文献或网址

(5) 贸易规模（记为TRADE）。一般情况下，企业国际化通常遵循从出口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认为出口先于国外生产，因此出口催生对外直接投资。^③一国企业在出口的过程中，首先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的信息和环境，并积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从而为在国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出口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先导作用。同时贸易规模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放度水平，开放度越高，该地区的对外经济交流越充分、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也更为开明积极，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为此，我们将贸易规模纳入控制变量，根据当年的贸易额除以GDP测算，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DOC）。^④

除了上述经济变量，我们还加入以下两个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各州政府是否在中国设有办公室或者代表处（记为DUMMY1），有设为1，无设为0，该变量反映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环境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第二个变量是地理位置变量（记为DUMMY1），如果沿海，设为1，内陆则设为0，地理位置影响运输成本，从全球大多数国家FDI的区位分布特征来看，向沿海地区集聚已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共同规律。

(二) 模型设定

^① Ruud A. de Mooij and Sjeff Ederveen, "Tax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ynthe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ol.10, No.6, 2003, pp.673-693.

^②

^③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0, No.2, 1966, pp.190-207.

^④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OFDI_{it} = \beta_0 + \beta_1 PARTY_{it} + \beta_2 PGDP_{it} + \beta_3 PWAGE_{it} + \beta_4 TECH_{it} + \beta_5 TAX_{it} + \beta_6 TRADE_{it} + \beta_7 DUMMY1_i + \beta_8 DUMMY2_i + \varepsilon_{it}$$

其中，OFDI 表示各州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规模，PARTY 代表各州的党派政治倾向，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 (PGDP)、工资水平 (WAGE)、技术水平 (TECH)、税收成本 (TAX)、贸易水平 (TRADE) 以及是否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DUMMY1) 和是否沿海 (DUMMY2) 两个虚拟变量， ε 是扰动项。

(三) 实证方法

由于企业投资定位决策是典型的离散选择 (Discrete Choice) 问题，决策者在考察若干目标地点过程中，结合备选对象的区位特征和自身特征做出唯一的选择，相应的计量模型必须能反映这种决策过程。1974年，丹尼尔·麦克法登 (Daniel McFadden) 建立的条件逻辑特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LM) 最适合于解决此类无序选择问题，并已在定位选择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①

假设以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实施定位决策，在观察 n 个地区的区位特征之后，最终选择地区 i 进行投资的条件概率为：

$$P_i = \frac{e^{\theta_i + \beta X_i}}{\sum_n e^{\theta_j + \beta X_j}}$$

式即为 CLM 模型，式中区位要素 x 的影响系数 β 可通过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CLM 中关于误差分布的假设要求模型数据符合无关备择独立性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 条件，即选择两个城市的相对概率 (P_i/P_j) 仅依赖于 x_i 与 x_j ，与模型中任何第三个城市的区位特征无关。然而，投资者的定位选择过程往往违背这种假设条件，空间距离和发展水平的差异都会导致地区间替代程度存在较大差别。此时，有必要采用嵌套逻辑特模型 (Nested Logit Model, NLM) 对样本数据进行重新估计。由于本文要解释的是各州吸引的中国企业投资的数量，该变量是典型非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嵌套逻辑特模型对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

^① Daniel McFadden,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Travel Deman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3, No.4, 1974, pp.303-328.



做计量分析。

四 实证结果

(一) 回归结果分析

在用计量模型之前，为了防止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给回归结果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2），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普遍小于 0.5，可以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还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变量是平稳的，因而不会在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问题。

表 2 相关系数矩阵表

	PARTY	PGDP	PWAGE	TECH	TAX	TRADE
PARTY	1.000					
PGDP	0.038	1.000				
PWAGE	0.035	0.251	1.000			
TECH	0.014	0.296	0.154	1.000		
TAX	0.025	0.123	0.154	0.086	1.000	
TRADE	0.013	0.362	0.165	0.146	0.052	1.000

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条件 logit 和嵌套 logit 模型，以企业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区位决策做计量分析。表 3 分别给出了标准的 CLM 以及 NLM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从模型的最大似然函数值和各变量系数的标准误差来看，NLM 模型要略优于 CLM 模型，而且 NLM 模型也通过了异方差检验，说明 NLM 模型的处理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

表 3 中国企业在美 FDI 区位决策因素的逻辑特回归结果



	CLM		NLM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PARTY	0.662**	0.027	0.682**	0.022
PGDP	0.440***	0.036	0.457***	0.031
PWAGE	-0.327	0.051	-0.332	0.042
TECH	0.005***	0.428	0.013***	0.383
TAX	-0.053	0.153	-0.051	0.103
TRADE	0.051***	0.035	0.062***	0.034
DUMMY1	0.526***	0.025	0.503***	0.021
DUMMY2	0.538***	0.014	0.512***	0.012
LogL	563.12		212.13	
LR(2)	—		186.18	
OBS	176		176	

注：LogL 为最大对数似然函数值，LR(2)为组间异方差似然比检验值，OBS 为观察样本数。***、**、* 分别表示通过 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来看，PARTY 对 FDI 流入影响较为显著，回归系数达到 0.662，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这基本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即党派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的地区，通常较为关注普通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经济政策上倾向提高就业和工人福利，因此在外资政策上也采取较为友好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也倾向于投资左翼政党执政的地区，因为他们可以从当地政府获得更为优惠的投资或税收政策，并且减少未来投资不确定的政治风险。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表中结果表明，PGDP 变量和 TECH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实证结论保持一致。市场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对 FDI 吸引力就越大。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和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正成为中美贸易发展的最大障



碍。为了绕开贸易壁垒，一些中国企业希望借助 OFDI 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市场规模靠前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纽约州都成为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重要聚集地。同时，美国也是高科技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长期的研发和创新鼓励机制使得美国企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拥有独立的研究实验室达 11 万多个，其中较大型的政府研究机构 600 多个。中国企业对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创建新企业、并购适用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等形式，接近技术创新源头，参与当地技术创新网络，获取技术开发资源，激励并增强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其次，PWAGE 和 TAX 的回归系数的符号虽然与预期相符，但误差较大，都无法通过显著性概率检验。可见地区劳动力成本和税收成本对 FDI 流入虽然有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大多数跨国公司在美投资不是出于成本驱动，而是跟踪先进技术和拓展市场，因此劳动力因素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美国州和地方的税收负担水平的确是很多企业选址投资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外国投资者对本地的税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①然而，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更多是获取战略资产，同时美国地方政府会有不同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他们所欢迎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可能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税收因素并没有成为中国对美 OFDI 的决定因素。

此外，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概率检验。简·约翰森（Jan Johanson）和简-埃里克·瓦尔尼（Jan-Erik Vahlne）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两者可以结合起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可以利用之前在东道国积累的出口贸易经验再对其进行投资。^②对东道国的出口水平是衡量其市场以及贸易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的指标器，中国对美国某个州的出口越多，表明该地区市场购买力越强，和中国的关系越紧密，因而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虚拟变量 DUMMY1 和 DUMMY2 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表明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和地理位置沿海的州，由于运输成本较低、人员信息交流便利，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

^① James R. Hines Jr., "Altered States: 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meric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4397, 1993.

^② Jan Johanson and Jan-Erik Vahln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8, No.1, 1977, pp.23-32.



(二) 理论机制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即党派倾向对中国在美 OFDI 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于“党派价格效应”的理论作用机制，本文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是否存在“就业创造效应”。如果中国在美投资企业显著增加了美国当地就业数量或者提高了雇员的工资，表明中国 FDI 具有明显的亲劳动属性，当地政府会采取更友好的态度和优惠政策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相反，如果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动机是为了“掠夺”资源，或者仅仅是响应中央政府“走出去”的政治号召，那中国 FDI 对当地的就业促进效应可能就不明显，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企业无法获得当地劳动者联盟的支持。

根据美国荣鼎集团对中国自 2000 年至 2012 年在美国投资的 600 项交易的追踪统计，中国在美国企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已由 2000 年的 1500 人迅速上升至 2012 年的近 30000 人，扩大了 20 倍。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中资企业吸纳美国就业仍然十分有限，金融危机之后吸收的美国就业人数以年均 20% 的速度增长，成为促进美国就业增长的主力军。比如，万象集团自从 1994 年进入美国市场，如今已成为集投资开发、自主经营和商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商社，招收美国员工将近 6000 人。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拥有当地员工约 350 人。华为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设立的研发中心，在当地招聘了 1500 名技术研发人员。2007 年，三一集团投资 6000 万美元在佐治亚州建造了一座 40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与制造设施，2012 年，公司宣布追加 2500 万美元投资，在制造设施附近建造一座研发中心。竣工后，三一集团将在佐治亚州创造约 500 个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已经创造的 120 个就业岗位。与上述绿地投资相比，虽然跨国并购投资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作用可能不明显，但事实上中国企业近年来通过新资金的注入和经营模式调整，已经让一些在金融危机中濒临破产的企业逐渐复苏并开始招聘新员工。例如，2011 年，美国西锐（Cirrus）公司被中航工业集团收购后，中航不仅保留了在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的 500 个就业岗位，而且每年新增 100 个在美国的就业岗位。腾讯在收购了美国 Riot 网游开发商后，计划新增 150 个工作岗位和招聘 500 多名当地员工。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未来中国将取代日本、德国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最多的外资来源国，到 2020 年可能吸收美国 20-40 万就业



人口。^①

根据上述分析，由于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制造业回归”，而制造业中有一些美国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这些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比如说家电、汽车、通讯等。中国的这些产业到美投资，不但带动了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雇佣了当地的员工，缓解了政治社会矛盾。由于在当地直接创造众多就业机会，从当地公司购买大量产品与服务以及努力承担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美国地方政府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从要素分配效应的角度，中国企业直接创造了劳动力需求，因此与地方政府的左翼政党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此外，对于不同投资方式区位选择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理解资产专用性对双方动态利益的影响，并由此决定党派政治在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决定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投资方式，即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投资，本文进一步根据投资方式区分的各州绿地投资额和跨国并购投资额，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各州的党派政治倾向，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投资额而非企业投资数，对于连续变量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方法进行回归估计。从对绿地投资 FDI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PARTY 对其投资额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且能通过 5% 的显著性概率检验，相反，在跨国并购的回归结果中，PARTY 对其投资额的回归系数虽然也为正，但却无法通过 10% 的显著性概率检验（见表 4）。这充分表明，对于两种不同的对外投资方式，党派政治因素对于绿地投资的影响要明显超过跨国并购。绿地投资方式下企业设立成本很高，退出难度也较大。并购的优点在于跨国公司能够很快形成生产能力，继承现有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供应链，同时如果由于管理整合失败导致企业需要退出，也可以较为容易的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售出股票的方式实现。根据资产专用型的理论，绿地投资要比跨国并购投资具有更强的投资资产专用性，这也意味着为了与东道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政治联系，同时也由于绿地投资企业相比并购企业能够给当地增加更多的就业，外商投资企业通常会在左翼倾向较高的地区优先选择绿地投资这种方式，或者说更多的绿地投资、FDI 会重点集聚在劳动者联盟当政的地区。

^① 数据来源于 Rhodium Group China Investment Monitor, <http://rhg.com/articles/the-employment-impacts-of-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 登录时间：2014 年 7 月 6 日。



表 4 不同投资方式下回归检验结果

	绿地投资	跨国并购
PARTY	5.834** (4.45)	7.183 (0.15)
PGDP	0.603*** (4.99)	0.318*** (3.54)
PWAGE	-0.916* (1.36)	0.945 (0.30)
TECH	0.682* (1.38)	0.673** (2.12)
TAX	-0.001 (-0.77)	-0.003 (-0.38)
TRADE	0.066*** (5.00)	0.043** (2.87)
DUMMY1	0.256*** (5.25)	0.234*** (4.36)
DUMMY2	0.268*** (6.86)	0.265*** (5.36)
常数项	-18.325*** (-6.86)	-11.321*** (-4.22)
Chi2 值	959.28***	929.16***

注：括号内显示的为 t 值。***、**、*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除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各州吸引的中国 FDI 金额纳入实证模型，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到 FDI 金额并不是非连续的变量，我们直接采用面板数据的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同时之前的研究均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但无法忽视存在反向因果问题的可能性，因为确实存在党派政治倾向促进各州更多吸引 FDI 的情况，但也无法排除 FDI 流入较多的地区会通过要素价格效应影响各州的党派构成，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高斯混合模型（GMM）估计对前文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在两种估计方法下，党派政治倾向对各州吸引中国 FDI 的影响在系数和显著性检验方面都没有变化，该结果与之前的检验方法得出的结果一致，证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是可信且具有说服力的（见表 5）。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GMM 模型
PARTY	3.526** (4.25)	3.538** (4.316)
PGDP	0.682*** (5.59)	0.629*** (5.54)
PWAGE	-0.859 (0.32)	-0.826 (0.86)
TECH	0.832*** (5.85)	0.895** (3.08)
TAX	-0.002 (-1.25)	-0.003* (-2.56)
TRADE	0.082*** (6.02)	0.078*** (6.87)
DUMMY1	0.368*** (4.25)	0.334*** (4.18)
DUMMY2	0.298*** (8.31)	0.295*** (7.46)
常数项	20.356***	18.179***



	(5.26)	(6.35)
R2	0.535	0.524
Chi2 值	1025.25***	1028.12***

注：括号内显示的为 t 值。***、**、*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五 结 论

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国际贸易体系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金融体系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国际投资体系尚无具有广泛性和约束力的全球投资协定。尽管 2008 年中美两国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但由于两国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导致双方目前还未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遇到诸多政治因素的障碍。比如，2005 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华为在美国的一系列受阻投资以及三一集团在俄勒冈州的风场发电项目受阻，都为中美经济深入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由此可见，国际资本在不同主权管辖的国家领土之间流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和结果，仅仅从经济意义上理解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和东道国政策选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结合政治角度全面考察国家、部门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

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以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流动时产生的利益为基础，突出利益分配的党派政治性，假设 FDI 通过改变东道国要素的相对需求从而影响要素所有者的收益，由此导致一国或地区接受 FDI 的程度最终取决于东道国政府与潜在外国投资者的战略互动行为。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亲劳动的政府会更加欢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投资企业也倾向于选择劳动者联盟当权的政府。本文进一步采用 2009-2012 年中国对美国各州 FDI 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各州党派政治倾向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于绿地投资的影响则更加显著；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税收、贸易规模等其他因素给定的前提下，中国企业会优先选址在左翼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的州进行投资。

党派政治倾向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这一发现不但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也对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企业的对美国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时，除了考虑当地的经济因素之外，还要适当考虑当地的政治因素，比如其党派政治倾向，对美国各州的地区优势做出比较并进行客观评价后，最终做出最佳区位选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党竞争的复杂性，外资政策的最终结果并不简单取决于持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还要看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比如，金融危机后，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为了扭转美国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升高的困境，对外资都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对美国各州外资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必须结合美国各州所面临的整体政治和经济环境，尤其是各州产业结构特点和利益集团部门对两党的影响，进行全面、历史的政治经济分析。

(作者：韩剑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徐秀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IPER 系列简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PER）包括政经观察和工作论文两个子系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组织和发布。

责任条款：本报告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看法，并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